

抗战时期的 民族矛盾与党派政争

——国共两党在伊盟事变中的策略应对

高凤仪

1937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归绥（今呼和浩特），马占山东北挺进军、白海风蒙旗独立旅等国民党部队与日寇激战二日后败北，分别经包头过黄河，进入伊克昭盟。不久，日伪军进攻伊盟。国民党先后调集高双成第二十二军、门炳岳骑六军驰援伊盟，打赢了东胜保卫战、收复杭锦旗之战、沿河追击日伪之战等，沿黄河与日伪军形成军事对峙，使伊克昭盟成为抗战时期唯一得以保全的盟级蒙古族地区。在此前后，毗邻伊克昭盟的中共陕甘宁边区亦派出大量党政军人员进入伊盟，先后建立数块根据地，并广泛开展对蒙统战工作，在宣传、组织、民运、军事等方面与国民党形成竞争态势。由于国民党驻军给蒙旗政府和当地人民增加了负担，国民党又陆续在伊盟地区推行保甲制，并以设立民众组训处和办事处的方式，对汉民聚居区实施治理，使传统的蒙旗自治权力受到侵蚀，导致绥远省政府与盟、旗政府发生矛盾。中共陕甘宁边区因在陕蒙边界征粮征税、建军建政、在伊盟腹地开辟桃力民根据地等问题，与蒙旗当局时有冲突，因盐湖税收问题，1939年4月及12月、1941年1月5日和16日，八路军与鄂托克旗蒙古保安团四次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均有伤亡^①。抗战时期的伊克昭盟，各民族、各党派御侮图存的主流之下，有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发生潜在影响，有战时社会难以调和的利益争端，有政党斗争对族际矛盾的催化，

^① 萨楚日勒图：《鄂尔多斯革命史》（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第251-253页。

有政策偏差导致的民间反抗，国共矛盾与民族矛盾似隐似显，时起时伏。

1941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加强伊克昭盟的军事组织，成立伊盟守备军司令部，原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调任伊盟守备军总司令兼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国民政府委员、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蒙旗宣慰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王爷，以下简称沙王，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蒙会）。陈长捷上任后，其武人的强势作风与不合时宜的改革措施，脱离了抗战以来国民党在伊克昭盟一以贯之的怀柔与求稳政策，很快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1942年底，陈长捷声称已获蒋介石同意，在伊盟七旗开垦蒙地，以济军粮，遭到蒙旗上下一致反对，双方互不相让，陷入僵局^①。1943年初，沙王派其心腹白音仓与陈长捷交涉开垦问题。白音仓擅做主张，满口答应陈长捷的开垦要求，札萨克旗仕官一片哗然。该旗西协理、保安司令鄂其尔巴图，保安团排长老赖等密谋刺杀了白音仓。白音仓被害后，其死党极为愤怒且极端恐惧，秘密派人向陈长捷请求派兵保护，陈派骑兵一连前往^②。鄂其尔巴图、老赖等人见形势紧张，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1943年3月26日拂晓，保安团400多人，向绥蒙会、国民党绥蒙党部和伊盟中学校长院进攻^③。变兵枪杀党、政、军、学汉籍职员顾兆忠等8人，重伤2人，“各机关公私物件全部被劫一空，中央及各方派驻札旗人员被缚监视，内外交通断绝。”^④这一事件史称“伊盟事变”或“三二六事件”、“札旗事变”。

面对伊盟事变，国共两党均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围绕沙王集团的政治选择，国、共、蒙三方形成微妙复杂的政治博弈。

一 国民党的应对

根据各方冲突的性质与强度，伊盟事变从开始到结束，可分为武装冲

① 陈长捷所言不实。对陈长捷军垦的申报，蒙藏委员会表示反对，军政部和农林部谨慎同意。详见《伊盟事件资料汇编》（以下简称《资料汇编》）第4辑，内蒙古伊克昭盟档案馆、第115、83页。《资料汇编》共4辑，系伊克昭盟档案馆通过档案系统的合作，复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原始资料编辑而成，属馆藏资料。

② 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函蒋委员长〈据平绥路党部主委刘桂电陈札萨克旗事变经过谨摘要报请鉴核由〉》，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46/3/31。

③ 经革陈：《札萨克旗事变亲历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3辑《伊盟事变》，呼和浩特，1991，第33页。

④ 伊盟民众教育馆馆长绳景信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电报，1943年4月16日，《资料汇编》第3辑，第124页。

突、政治谈判、善后处理三个阶段。

从3月26日爆发札旗事变到6月上旬国民党新二十六师在乌审旗蒙古王公奇玉山配合下攻占乌审旗西官府（西协理驻节办公之所），迫使西乌审起事部队退入中共根据地，国民党当局以军事镇剿为主、政治调解为辅，札萨克、乌审两旗生灵涂炭，地方糜烂，是为武装冲突阶段。

从6月中旬到8月下旬，国民党对伊盟大部地区的军事控制已告稳定，其政策出现微妙的调整，转变为武力恫吓为辅、政治调解为主，是为政治谈判阶段。

从8月底9月初国民党与札旗方面就和平解决事变达成共识，到1944年初沙王复职，国民党对以沙王为首的盟旗统治集团极力拉拢抚慰，并赈济蒙民、补偿损失、调整人事、改革蒙政、明定赏罚，对伊盟事变进行了一系列善后工作，是为善后处理阶段。

（一）国民党决策系统的信息判断与政治考量

在对待伊盟事件的态度及处理事件的方法上，蒙旗自治机关、蒙藏委员会、绥远省府、伊盟周边地区军事领袖、国民党军事系统、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互有微妙的分歧。

蒙旗自治机关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陈长捷的暴行，对起事部队持同情与宽容态度，要求国民党中央答应蒙方要求，公平公正地做出处理。札旗事变当天，绥境蒙政会各委员即以沙王领衔致电蒙藏委员会，解释事变的原因“出于义愤所激”，“事前王府毫不知情”^①。

较为熟悉蒙事的蒙藏委员会与绥远省府对伊盟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有相对理性的认识，在解决伊盟事件中偏向于柔性策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主张取柔性攻势：“似应把握一般蒙人心理，示之以恩感化之。”^②蒙藏委员会复电表示，已“转电陈总司令缓和应对”^③。陕北邓宝珊、高双成及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军事领袖，主和的倾向极为明显。应各方请求，邓宝珊、高双成连续派出代表与沙王接触，并利用近似第三者的身份，请沙王到榆林暂住。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电报中，也

① 沙王等：《关于伊盟事变起因给吴的电报》，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03。

② 傅作义：《关于叛兵情况及进攻清剿情况的报告》，《资料汇编》第3辑，第86页。

③ 吴忠信：《关于札旗事变勿用兵弹压并随时电示情形致傅作义电》，《资料汇编》第3辑，第117页。

提议约束军事行动^①。对武力追剿最为不满的当属各路和谈代表。乌审旗兵变后，乌审旗特务连把“南京（应为重庆）派来处理札旗起义的四五人，都给杀了”^②。邓宝珊、高双成派赴乌审旗的谈判代表王公弼、彭尔玉和绥蒙会委派的代表任秉钧被起事部队驱逐出境，在驱逐过程中，王公弼又被变兵所杀^③。察哈尔蒙旗特派员马鹤天在给蒙藏会的报告中称：“历次和平均误断（于）未先暂停军事行动，致对方见疑，钧座似应建议军事当局转饬暂停军事，俾和平进行顺利。”^④

对武力镇压最为热衷的是伊盟军事当局。陈长捷一口咬定札旗事变是中共策动的武装叛乱，刺激国民党决策层支持其武力镇压行动。国民党阵营内和与战的分歧，也体现在信息情报工作中，主战派的情报多关注于中共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夸大伊盟事件的政治背景，而蒙藏委员会系统的情报则对民族关系恶化的情况注意捕捉，提请当局考虑武力政策的恶果。蒙藏委员会驻伊盟协赞专员邹焕宇在4月12日的电报中即表示，札旗事变“似无奸党背景”^⑤。蒙藏会于1943年4月起草的《对伊盟事变的分析及对策》一文，对事变的演化感到忧虑，称：“如事态长期恶化，可能参入敌伪活动及牵涉其他地方部队（如高双成、马占山、马鸿逵）之复杂关系”。因此，蒙藏会提出“派大员前往调查解决”等建议^⑥。

面对陈长捷报复性的军事镇压，沙王集团采取了极为务实的策略，将斗争矛头锁定为陈长捷，寄希望于国民党中央的公正处理。在策略运用中，采用了柔性与刚性的两手，一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追剿予以坚决抵抗，一面以悲情诉求争取蒙事系统、周边地方军事领袖的支持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谅解，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表明拥护中央、拥护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同时，专挑国民党政府的大忌，与共产党寻求合作，又有意制造沙王被劫持的假象，预留退路。中共适时介入，日伪趁机挑拨，族际冲突加剧，国民党内部主和声音上扬，种种内外压力制约着国民党的军事行动。

① 马鸿逵：《关于伊盟事变给蒙藏委员会的电报》，《资料汇编》第3辑，第257页。

② 张秉义、何知文：《西乌审起义前后》，《伊盟革命斗争史料》第2辑，伊盟党史办编印，1983，第67页。

③ 李志高、王文光：《伊盟事变初探》，《伊盟革命斗争史料》第2辑，第37~38页。

④ 马鹤天：《札旗事变后之情形》，《资料汇编》第4辑，第24页。

⑤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03。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24~125页。

对伊盟事变的发展方向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态度与决策。蒋介石于4月6日审阅了有关伊盟事变的报告，据国民党官方记载，4月6日当天，蒋介石“得报，上月二十五日夜（应为26日晨），伊盟札萨克旗保安队受共党煽惑，突然暴动，伊盟中学校长经天禄被劫，沙王府被围，蒙政会陷于混乱状态。公自记曰：‘中共在绥远伊盟运动保安队叛变，挟持沙盟长西行，思之痛心，匪徒之害国殃民，若不根绝，无以立国矣！’”^① 4月26日的唐纵日记从侧面较为清晰地反映了蒋介石对伊盟事变性质之认定与策略之考量：“札萨克旗事变，显然与奸伪有关，委座曾令傅副长官（指傅作义）乘机占据有关各要点。昨日并令胡副长官（指胡宗南）对匪区盐池与囊形地带竭力准备，一鼓收复，并注意后方交通要点。”^② 随着事态的逐渐明朗，蒋介石的应对策略也在逐步调整。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召见沙王派赴重庆的代表贺守忠，委托贺速返伊盟，亲手转交军委会致沙王的信^③。沙王西逃后，傅作义电请蒙藏会“取消沙盟长一切职务，免为奸党利用”。蒙藏会拿捏不准，于5月24日函请蒋介石裁示，蒋批复：“所请撤销沙王名义一节暂从缓议可也。”^④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中央运用比较折中的办法解决人事问题，任命素孚众望的郡王旗札萨克图王为代理盟长兼绥蒙会委员长^⑤。对沙王的原有职务，均予保留，以待来归。在此前后，蒋介石派特使谈经国（时任军委会校阅主任）赴伊盟联络王公，慰问蒙民^⑥。在事变期间，蒋介石还以行政院长身份批拨了大量救济蒙民、补偿损失的经费。

（二）国民党应对危局的基本方法

国民党解决伊盟事变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军事手段“灭火”，以政治协调“止争”，以经济怀柔“求稳”，以补救措施“疗伤”。

①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台北，1978，第303页。

②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第352-353页。

③ 贺守忠：《伊盟事变前奉派赴渝请命经过》，《伊盟事变》，第128页。

④ 军委会：《关于蒙藏委员会5月24日呈呈“请撤销沙王名义”一节的答复》，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11。

⑤ 蒋中正：《以图布升吉尔格勒代理伊盟盟长等职务的指令》，《资料汇编》第3辑，第32页。

⑥ 施宗森：《关于主任委员谈经国来东胜与图王谈话有关事项的代电》，《资料汇编》第4辑，第199-202页。

军事手段。3月26日发生兵变后，面对其他各旗的蠢蠢欲动，国民党的第一反应是以军事手段扑灭变军并监视恫吓各旗蒙兵。国民党急调步兵新二十六师驰赴札萨克旗与乌审旗交界处，以图截断札旗保安团与陕甘宁边区中共武装的合流，急调骑兵第七师第二十团贺迪光部驰赴札萨克旗实施包围，以图封锁起事部队，不战而屈之。命令宁夏军队马鸿宾部监视鄂托克、杭锦两旗，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监视准格尔、郡王两旗^①。要求陕北邓宝珊、高双成部劝诱收留或严剿南逃变兵^②。要求陕北榆林和宁夏当局派兵监视中共军事行动，令绥西与伊盟前线驻军监视日伪军及达旗保安队，新十七师王雷震部作预备队^③。在伊盟事变过程中，国民党军事、党务、行政、情报各系统全速启动，并动用宁、陕地方军事领袖的关系，瓦解、劝导蒙旗反抗情绪。札旗事变时，鄂旗旗主章文轩到青海塔尔寺礼佛未归，仕官已做好军事准备，兵变如箭在弦。4月9日，章文轩经宁夏归来，因鄂旗形势紧张，不及会晤马鸿逵便匆匆返旗。马鸿逵闻讯即派省党部委员李作栋、省政府参议赵牧，于12日赴鄂旗拜访章文轩^④。马鸿逵的劝导显然很有成效，章文轩返回鄂托克旗后，“将集中之保安队，一律解散，并调解札旗事变。”^⑤

政治协调。第一步：恢复蒙政、争取王公。对留在札旗的蒙旗仕官，国民党给以优待，以争取其支持，如札旗保安队副官长奇文卿恰在鄂旗，没有参与兵变，事变后到东胜拜见陈长捷，陈赠给旅费1000元，请求他规劝蒙古官民返回札旗，恢复旗政^⑥。7月，札萨克旗政府恢复办公，对流散旗民积极招回，妥为安抚^⑦。同时，国民党努力争取素孚重望的蒙旗王公图王的支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致电图王，恳请其主持盟务。5月11日图王复电吴忠信，表示：“唯念事变未平，只得勉强维持。”^⑧答应了国民党方面的请求。国民政府遂以行政院令任命图王代理沙王的一切职

①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蒙藏委员会《抄送札乌事变情报》，《资料汇编》第3辑，第70页。

② 傅作义致蒋介石、何应钦卯支申裁电，《资料汇编》第3辑，第73页。

③ 马鹤天：《札旗事变后之情形》，《资料汇编》第4辑，第22~23页。

④ 中央调查统计局：《伊盟事件续讯》，《资料汇编》第3辑，第68页。

⑤ 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第五处：《关于解散鄂旗保安队等情况的抄件》，《资料汇编》第3辑，第95页。

⑥ 陈秉伟致蒙藏委员会电报，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04。

⑦ 傅作义：《恢复旗政，安定人心，给蒙藏委员会的代电》，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11。

⑧ 《资料汇编》第3辑，第27页。

务。蒙政机构的恢复，以及蒙旗王公的合作，使国民党恢复了以蒙政机构号令伊盟的主动权。

第二步：派出使者、“营救沙王”。事件爆发之初，陕北军事领袖邓宝珊、高双成派员到伊盟“慰问沙氏，并请沙氏来榆林暂住，已筹备国府委员沙克都尔札布行辕”^①。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接到关于札旗事变的电报后，立即派参谋苗玉田、蒙务组长王任之为正副代表，赴伊盟安抚蒙古官民^②。4月17日，从事对蒙工作多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玉甲（陈长捷被撤职查办后接替陈长捷担任伊盟守备军总司令）受傅作义委派，赴伊盟开展和平工作。陈玉甲赴伊盟不久，傅作义又派代表马遇辰等二人于5月30日抵达伊盟杭锦旗做“慰问安定”工作^③。驻节西北的胡宗南接到蒋介石指令后，也派出熟悉蒙事的高级教官连钟山带通信兵一个班和中央军校七分教一批蒙籍学员到伊盟开展和平工作。连钟山到鄂托克旗后，宁夏马鸿逵派来的代表赵牧、陕北邓宝珊续派的代表谷莲芳、绥远傅作义代表王任之以及受蒋介石委托，向沙王转信函的绥蒙会干部贺守忠齐集鄂托克旗，各方代表通过鄂旗旗主章文轩的关系与沙王取得联系，沙王派其代表与鄂旗旗主章文轩有过数次交谈，基本达成了共识。后章文轩派其副司令偕贺守忠面见沙王，送交蒋介石给沙王的信，沙王见到蒋信后不久就率全部人马抵达鄂托克旗^④。沙王回归国民党阵营，成为伊盟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

第三步：开展宣传、招抚流亡。图王主持盟务后，于5月7日以绥蒙会、盟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对伊盟事变的性质做了有利于国民党政治需要的定义，称札、乌两旗事变“皆受奸伪煽惑”，表示：“凡已脱离叛部回家安居者，均予不究暨往，如自动缴枪者，赏洋五百元，并保证其安全。”^⑤同时，国民党政工人员深入各蒙旗宣传国民党政策，劝诱蒙古官民拥护中央、反对叛乱。

政治协调的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可概括为调整政策、迎合蒙民。随着事态的明朗，国民党决策层对事变起因的认识逐步清晰，4月27

① 转引自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国民史史料长编》（6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351页。

② 王任之：《受傅作义派遣赴伊盟迎回沙王经过》，《伊盟事变》，第142页。

③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04。

④ 连钟山：《我赴伊盟迎接沙王回札旗的经过》，《伊盟事变》，第139~140页。

⑤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11。

日傅作义致蒙藏委员会的电文称：“伊盟札旗确因推行军垦军粮购驼等事引起蒙民普遍误会。”^①对沙王提出的停止军垦等要求，国民党方面一口答应，对札旗方面毫无谴责之意^②。

经济怀柔。在军事手段与政治协调双管齐下的基础上，国民党的老办法也发挥了作用，即经济怀柔、花钱买稳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致蒋介石的密电中称：“傅主席作义电请拨款救济，并称近来归旗蒙民以无食宿，又复离去等语，似此情形，倘不迅予有效救济与安抚，则为叛众裹胁之蒙民，势必冥行不迨。”基于招抚蒙民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批拨了为数不少的赈济资金。绥蒙指导长官公署于4月向行政院请款，电文披露，绥蒙指署为札、乌两旗安抚救济事宜已垫支150余万元，除行政院已拨50万元外，尚有100余万的缺口亟待归还。行政院批复，追加60万元。7月，蒋介石应傅作义之请，向绥远省政府和邓宝珊处批拨已垫发的救济安抚费共45800元。对札旗被难职员眷属，行政院以紧急命令飭由财政部拨发赈款10万元责成绥远省府统筹救济。绥蒙指导长官公署于年底的报告中又罗列了9项已垫付的开支项目，包括按蒋介石指示，救济沙王及札旗保安队糜麦450市石（285000元）；修建沙王府、绥蒙会、成吉思汗陵52万元；救济绥蒙会职员冬季棉衣、补助图王代理盟长经费、各类接待费用等37.3万元；派员出差旅费14.4万元；为札、乌两旗保安队缝制单服400套（20万元）。傅作义在招抚札、乌两旗蒙民时，向行政院请款32万元，蒋介石迅即批示：“已以紧急命令飭部拨汇绥远省政府急振款叁拾贰万元并电傅主席统筹配放，该会（指蒙藏会）及振济委员会无庸派员前往会同办理，以免费时。”关于放赈，另有马鹤天申勘电披露：“指署派谢君偕振委会吴秘书来伊盟放札、乌二旗振款，计每成人一百元，幼童五十元，大部放毕，当余一部俟沙回旗再放。”^③

补救措施。从4月2日至6月初，札、乌两旗的军事冲突、民间仇杀及军纪失控给伊盟人民，特别是两旗的蒙古族官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国民党在处理伊盟事件过程中，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试图医治战乱的创伤，大体可概括为约束军纪、礼遇沙王、派员抚慰三项。

据骑七师廿一团团长胡逢泰回忆，该团参战后，召开排长以上军官会

① 《资料汇编》第3辑，第81~82页。

② 鄂其尔呼雅克图：《伊盟札萨克旗事变的回忆》，《伊盟事变》，第17页。

③ 本段引文均出自《资料汇编》第4辑，分见第115~116、141~142、149、155、162~163、165~166、19页。

议，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拿老乡一针一线，否则就地正法；部队出发以前，必须将驻地打扫干净，借物送还，损物赔偿；烧柴和马草，按价付款。在部队集合前，让向导翻译领上喇嘛，检查住室是否短少东西。胡逢泰回忆说，只是害怕出现军纪问题，被上级杀头^①。

8月底，国民党有关代表与沙王达成和平共识之后，国民党即以优厚的礼遇欢迎沙王归队。绥远省府“拨款十万元并给食粮二百石”用于接待沙王^②，国民政府“给了800万元法币”以补偿沙王府的损失^③。11月，蒋介石发布行政院长令，准沙王官复原职，并对副盟长人选做了调整，原副盟长阿王因久陷敌区，归来无望，免去其职务，由伊盟事变期间代理沙王职务的郡王旗札萨克图王升任副盟长，以资奖慰^④。对沙王之子鄂其尔呼雅克图，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是名义上的惩处与实质上的酬佣。蒙藏委员会善后办法的意见是：“鄂其尔呼雅克图参与叛变，应免帮办盟务及绥蒙会常务委员等，姑准留任札萨克，以观成效。”^⑤而事实上，一年之后，沙王病逝，图王继任盟长，鄂其尔呼雅克图即被递补为副盟长^⑥。据有关人士回忆，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代表为争取鄂其尔呼雅克图的支持，即承诺在事变解决之后保举其为副盟长^⑦。

沙王返札旗后，即致电国民党方面，主动承担责任、自请处分，并请救济蒙民，宽恕起事人员。沙王称：“布（沙王自称）职责所在，罪不能辞，除请严于处分外，并请转报委座施以如何救济为禱。”^⑧国民党方面坚持撤销事变主要发起人鄂其尔巴图及排长老赖的职务，其余人员一概免于追究责任。1944年2月，国民党驻军处决老赖，鄂其尔巴图闻讯逃亡^⑨。国民党政府对图王除提拔职务外，并传令嘉奖；对鄂旗旗主章文轩、乌审旗护理札萨克奇玉山传令嘉奖，并升兼绥蒙会委员，鄂、乌两旗“出力官兵由章、奇两司令查明保荐，分别晋级或发给奖金。其余伊盟各旗未参加叛变各旗主管，均属深明大义，一律传令嘉奖……殉难蒙族遗族，查明分

① 《资料汇编》第1辑，第59~67页。

② 傅作义致蒋介石、吴忠信电，《资料汇编》第4辑，第84页。

③ 鄂其尔呼雅克图：《伊盟札萨克旗事变的回忆》、《伊盟事变》，第18页。

④ 《资料汇编》第3辑，第54~56、51~52页。

⑤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第148页。

⑥ 《伊盟事变》，第145页。

⑦ 王任之：《受傅作义派遣赴伊盟迎回沙王经过》，《伊盟事变》，第145页。

⑧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110。

⑨ 《伊盟事变》，第181页。

别给予抚恤”^①。

沙王返旗后，国民党中央对伊盟的局势仍有忧虑。10月5日，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蒙藏会委员长吴忠信联名致信蒋介石，建议派大员前往伊盟慰问蒙古官民，具体方案为：抚恤及善后经费安排400万元。伊盟七旗及盟政府，每单位送礼4份（札萨克，东、西协理，保安司令各一份），每份约5000元，特送沙王礼品费50000元，各旗保安队官兵，每人赏给50元。蒋介石于10月14日批准了何应钦、吴忠信的方案，并要求尽快落实^②。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由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任团长、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为副团长的国民政府宣慰团，于1943年底到札旗进行抚恤和慰问工作。

二 共产党的应对

伊盟事变迅速冲击到与伊克昭盟比邻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为伊盟事变疲于奔命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展开了积极的策略应对。

（一）中共的信息判断与政治态度

札旗事件事起突然。在事变之初，对伊盟事变后日伪乘机渗透的可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一样，深感忧虑。因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三边地委，“决不能放松反日伪的斗争……告诫蒙人在反陈何运动中小心上日伪的当。”^③面对伊盟事变后族际仇杀的危机，共产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乌审旗兵变发生后，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徐子猷随即抵达乌审旗府，适值乌审变兵处决被扣的汉籍国民党军政人员、教官和商人，徐予以阻止^④。对事变后急剧紧张的国共关系，中共决策者提出了积极而谨慎的应对策略。首先，确保陕甘宁边区的绝对安全。西北局指示三边地委：“三边驻军必须立即加强定、靖、盐一带的边防，严防一切可能事件发生。”^⑤其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第148-149页。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第152-153、154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17页。

④ 中共三边地委：《关于札萨克旗事变后乌审和鄂托克两旗的情况》，1943年5月26日，《伊盟事变》，第220页。

⑤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17页。

次，坚决地支持蒙人反对陈长捷，同时鲜明地表明维持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政治态度。西北局指示三边地委：“因国共合作关系，我们只能暗中帮助且要他们不宣扬。”第三，采用消极的方法干扰破坏国民党军事行动。如“建立蒙地我之秘密工作”，“沿边各县严禁粮食出境，绝不允许友军购粮”。第四，在处理伊盟事变中，以第三者角色出场，“调解双方和平合理解决事变，团结双方共同抗战建国。”^①

总体上，中共确立了一个基点、三条控制线的策略格局。即以支持蒙人反陈长捷为基点，控制日伪挑拨、控制民族仇杀、控制国共冲突。具体体现为政治的攻势与军事的守势，以武装对峙求安全，以秘密援助保和平，以政治工作谋发展。

（二）中共的策略应对及其成果

伊盟事变发生不久，中共即按照既定的方针守中有攻、稳中有取地开展工作。大体可概括为：策动兵变，反制国民党追剿；争取沙王，抢夺正义旗帜；支持蒙民，借机扩大政治影响。

策动兵变。中共策动的乌审旗兵变彻底打乱了国民党既定的以武力迅速解决伊盟事变的计划，缓解了札旗起事部队的军事压力。4月初，共产党方面与乌审旗西派领袖奇金山达成协议，共产党保证起义部队“指战员家属、牲畜和财产安全”^②。15日，西乌审部队在奇金山率领下攻占旗政府，捕获汉籍官员40余人，其中30余人被枪杀^③。西乌审旗地区明确投入共产党阵营，成为国共两党军事对峙的前哨^④。

乌审旗兵变使札、乌两旗起事部队得以合流，并安全退往中共根据地，前来追剿的国民党军队投鼠忌器，不得不放缓追剿的步伐。5月1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傅作义，反对陈长捷借伊盟事变乘机逼近陕甘宁边区^⑤。马鹤天给蒙藏委员会的电报中称：“八路军指责陈长捷何文鼎派兵南下，边区人心惶惶，除在三边公然增兵，扣留军粮，截断交通外，并在陕北沿碉堡线秘密增防士兵，携带干粮，似甚紧张。”由于共产党从一

① 内档伊盟文件选编24，第1页；25，第3页；均见《资料汇编》第1辑。

② 张秉义、何知文：《西乌审起义前后》，《伊盟革命斗争史料》第2辑，第60页。

③ 傅作义：《电报乌旗事变原因经过及其善后事宜等》，《资料汇编》第3辑，第113页。

④ 道尔吉宁布忆述、王庆富整理《奇国贤之死与奇金山起义》，《伊盟事变》，第72~74页。

⑤ 冯峰：《伊盟事变大事记》，《伊盟事变》，第210页。

开始就确立了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共合作的基调，因此对国民党的反击限定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之内，除零星的武装自卫外，基本采用政治方法反制国民党。同样，国民党方面也在回避矛盾。5月28日，绥远省府派赴伊盟开展政治工作的陈玉甲在给蒙藏委员会吴忠信的报告中称，乌审旗追剿部队“因与奸军（对共产党军队的诬称）仅一河之隔，为避免冲突计，对乌旗军事可告一段落，职同奇玉山会合进剿部队于感日返王府。”^① 在国共两党的克制下，战争的车轮在陕蒙边界略事摩擦后即停了下来。

争取沙王。自抗战爆发始，共产党对蒙上层统战的核心目标即锁定在对伊盟盟长沙王的争取上。伊盟事变为共产党争取沙王创造了绝好的条件。事变之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即指示三边地委，“应利用这一时机，极力争取沙王。”^② 沙王长期与国民党合作，并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已成为国内民族团结的象征性、指标性人物，国民党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面旗帜。国共两党围绕沙王展开政治攻守，形成竞争态势。

沙王府之战后，札旗保安团边打边撤，向乌审旗和陕甘宁边区方向转移，并派人与中共方面联系，请求援助。中共乌审旗工委立即将情况报告三边地委，并派工委副书记曹布诚迎接沙王，设法保护其安全^③。4月中旬，沙王一行抵达鄂托克旗南部，暂住于蒙古牧民家中。不久，傅作义所派代表苗玉田追踪而至，双方达成和平解决协议。由于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沙王放弃了面见傅作义的计划，决定进入陕甘宁边区^④。最后，沙王一行请八路军夜间来接人，以制造被共产党强迫带走的假象^⑤。

沙王进入红区后，蒙旗王公均以沙王被共产党“劫持”的说法，为沙王进入共产党根据地这一行动定性。代理沙王出任伊盟盟长的郡王旗札萨克图王，于7月12日致重庆当局的电文中称：“札旗保安队叛乱系受奸伪煽惑并非沙王主谋。查沙王在抗战期间安定伊盟，厥功甚伟，现困居红区，恳请设法营救，俾复自由。”^⑥ 札旗起事部队制造沙王被共产党“劫持”的假象，显然是为了保留与国民党谈判的余地，蒙旗王公众口一词地称沙王始而为叛徒挟持，继而被共产党劫去，其用意也是要从政治上保护

① 《资料汇编》第4辑，第22页；第3辑，第141页。

②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17页。

③ 贺晋年：《回顾伊盟事变后的一段往事》，《伊盟事变》，第151页。

④ 《贺晋年关于伊盟问题的报告》，《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712~713页。

⑤ 鄂其尔呼雅克图：《伊盟札萨克旗事变的回忆》，《伊盟事变》，第15页。

⑥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11。

沙王。国民党当局更是乐于接受沙王被劫持这一说法，这样可以抵消起事部队以沙王名义进行政治宣传的影响力，以“营救沙王”为名进兵，也显得师出有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共产党高喊保护沙王，国民党声称营救沙王，而沙王，恰恰和他的儿子鄂其尔呼雅克图以及他的家奴——札萨克旗蒙古官民在一起。

沙王一行进入边区后，受到中共方面的真诚欢迎与热情款待。毛泽东听到沙王进入边区的消息时，非常高兴，当即指示驻三边地区的警备三旅做好接待工作。警三旅旅长贺晋年在沙王驻节地掌高图住了一二十天，经常去看望沙王，就国内外时局交流看法。为了联络感情，贺晋年、赵通儒（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与沙王之子鄂其尔呼雅克图结拜为兄弟，并送给沙王5支驳壳枪和一些绸缎、布匹，沙王回赠一匹枣红马答谢。札旗部队陆续抵达西乌审根据地的有800多人，粮草需要量很大，警三旅抽调专人组成沙王及其部属服务的供给处。蒙古人喜欢吃炒米，靖边县动员群众制作炒米，保证供应，从三旅抽调了600套夏衣送给他们。贺晋年还特别交待负责接待的干部，要注意工作方式，大小事宜都要取得沙王父子的同意再进行，要尊重他们，对他们的行动不要加以干涉^①。据当时负责接待的中共干部惠志高回忆，警三旅在地瘠民贫的三边地区为札旗部队筹备给养，确实下了一番工夫。粮食是从靖边县各区运送的，酒和茶叶是由旅部从定边送来的，炒米就地动员群众赶制，牛奶向当地蒙古族人民收购一些，马匹主要是放青，也供应一部分马料。对当时的警三旅来说，这些援助确实是倾其所有了^②。

中共如此煞费苦心地接待沙王一行，有其明确的目的，即争取使沙王脱离国民党，投奔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其指示信中说：“（要向他们）说明依靠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如果沙王来延安，我们可以给他们发所有人数的冬衣，可以发他一百支好枪，给他们粮食吃。和国民党允许的三十万元法币、一百石粮食比一比，看是谁帮助他多。”^③

为了争取沙王，共产党还承受着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共产党争取沙王的情况很快被国民党掌握。国民党利用执政的有利条件向中共要人。6月

① 贺晋年：《回顾伊盟事变后的一段往事》，《伊盟事变》，第152-153页。

② 惠志高：《回忆接待沙王的一些情况》，《伊盟事变》，第167页。

③ 内档伊盟文件选编26，第2页，见《资料汇编》第1辑。

12日，陈玉甲完成乌审旗分化瓦解工作后，即致电与中共关系良好的陕北军事领袖邓宝珊，请邓“途经延安时顺便向该方交涉将沙王送出安全地区。”^①邓宝珊到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后，延安方面表示，如果札、乌两旗起事部队到边区落脚，一定令其缴械，但对有关沙王的问题刻意回避^②。邹焕宇致蒙藏委员会的电报中称：“毛泽东表示沙王并未退入边区，对协助营救一层狡辞推拒。”^③

然而，友情公关与政治劝说并不能突破政治信仰差异造成的隔阂。据时任中共鄂托克旗工委书记的高增培回忆：“尽管我们热情地接待和支持沙王，沙王对此也很感激，但他始终为自己留有退路……说明他对国民党还存有幻想，对共产党还有疑虑。”^④在国民党系统的文电中，有许多似真似假的关于沙王反共情绪的信息，如马鸿逵向蒋介石报告事变处理经过时称：“其间奸伪威胁、部属怂恿，沙王均不为动，且至以死自誓，终克脱险。”^⑤傅作义致蒙藏委员会的电报中，转述鄂旗旗主章文轩报告的情况，称沙王被“劫”时，“极伤痛”，担忧伊盟事变不能结束，“生灵涂炭，妨害我抗战前途，在不明真伪者以我为党国之罪人。”^⑥这些情报显然有加工渲染的成分，不过，内中所反映的沙王的政治态度应该是真实的，沙王最终还是返回了国民党阵营。

支持蒙民。在伊盟事变中，相较于前来镇剿的国民党正规军，札、乌两旗的起事部队无论是军事实力、后勤能力，还是斗争经验方面，都处于弱势。危难之际，共产党雪中送炭，予以援助，极大地赢得了蒙民人心。

1943年夏，毛泽东接见了札萨克旗东协理阿木古朗、乌审旗代表奇国华等伊盟蒙古族人士。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札、乌两旗起事情况，向蒙人代表表示，支持蒙古人起来反对陈长捷、何文鼎，武器、弹药尽量帮助，缺多少给多少。衣服、粮食按编制供给。毛泽东当场决定，给西乌审部队发40支步枪，帮助他们增编一个骑兵连，给在场蒙古人士每人发一支手枪^⑦。

①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04。

② 马鹤天致蒙藏委员会电，《资料汇编》第4辑，第33页。

③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03。

④ 高增培：《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篇章——回顾我党正确对待和处理伊盟事变的经过》，《伊盟事变》，第163页。

⑤ 内蒙古档案馆藏档案：439/107。

⑥ 《资料汇编》第3辑，第107页。

⑦ 道尔吉宁布忆述、王庆富整理《奇国贤之死与奇金山起义》，《伊盟事变》，第75页。

中共有关方面在政策限度内全力帮助札、乌两旗蒙古武装，同时表现出关怀与尊重少数民族的理念与政策，扩大了在伊盟地区的民意基础与组织基础，为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对蒙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 民族大义：三方博弈的道德底线

在伊盟事变的全过程中，国民党、共产党及伊克昭盟蒙古自治集团，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现实利益和信息判断参与到和、战两种形式的政治博弈之中，又基于国家利益的最高准则，战而有度，和而有本，所有当事人的活动都限定在民族大义的框架之内，内争不忘救国，折射出在一个特殊时代统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

伊盟蒙古民族的爱国传统。伊克昭盟的蒙古民族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近代以来，伊盟蒙古族官民经历了民族大义的三次考验：民国初年的外蒙独立、30年代的德王附逆以及伊盟事变中的政治选择。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久遭沙俄渗透的外蒙古随即宣布独立，并以活佛的名义连续向内蒙古六盟发来檄文，要求内、外蒙共襄“建国大业”。面对外蒙独立已成事实、国内政局陷于混乱、内蒙王公颇有动摇的变局，伊克昭盟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反对独立的立场上。1911年秋，伊克昭盟起草并发给外蒙古的复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十三问”，责问外蒙当局，以活佛名义宣布独立，政、教关系如何处理，是否符合宗教教规；蒙古建国，是否具备人才、财政、军事、教育、立都等条件；宣布独立，有无可能获得国际承认；独立后，有无力量防止俄国的侵略；一旦中国出兵，有无把握打赢独立之战等^①。

独立风波之后，又有1930年代的内蒙“自治运动”。面对德王集团借自治之名、行独立之实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以察绥分治的名义，将蒙政会一分为二，伊盟与乌兰察布盟及绥东四旗划归绥境蒙政会管理，从而将西蒙二盟从德王集团分割出来，以求保全。伊盟王公对国民政府的举措给予了积极的配合。1935年10月，伊盟各旗王公致电蒋介石，要求伊克昭盟另设自治委员会。蒋介石以特急电报通告傅作义有关沙王等人任绥蒙会职务的决定^②。1936年，绥东百灵庙抗战后，伊盟各旗派驻百灵庙德王自治

^① 《绥蒙辑要》，第172-175页，《内蒙古史志》(26)，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印制。

^② 《绥蒙辑要》，第203页。

政府的代表“自动撤回”，国民党组织的百灵庙抗战烈士追悼大会，“乌、伊两盟大多数旗的上层代表前往参加”。抗战前夕，乌、伊两盟“在两个盟长领导之下的王公，是向着离开百灵庙接近南京的方向走，最近在日寇新进攻下，他们都团结在沙盟长周围，向南京中枢各要人商讨绥蒙大计”^①。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在这一历史的关头，伊克昭盟又一次站在了民族大义的道德制高点。当日伪军逼近伊盟时，沙王于1937年11月5日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请“多派大军前来伊盟，驻守保护”^②。同日，沙王电全国各军政长官，表示“拥护中央，服从领袖，救国卫民，同仇敌忾，坚持到底，始终不渝”^③。伊盟蒙古民族拥护抗战的态度，使国民党大军保卫伊盟拥有了本土民意的支持，且在全国抗战阵营中增加了边疆少数民族认同国家主权的因素，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伊克昭盟遂成为抗战阵营中的一面旗帜。

伊盟事变使伊盟蒙古民族再一次经受检验。据随同沙王逃亡的绥蒙会常委阿凌阿讲，沙王府之战后，沙王一行开始向东走，准备到陕北榆林找邓宝珊、高双成协调解决与陈长捷的矛盾。出发不久就听到屠杀蒙古人的传言，不得已退了回来^④。后经沙王集团内部亲共人士的联系、协调、动员，沙王进入中共防区，也就是说，在伊盟事变中，沙王集团有过三次选择，初欲投邓宝珊，因惑于民族仇杀的谣言而退回，继投共产党，最后回归国民党，唯独没有选择近在黄河对岸的日本和伪蒙当局。伊盟事变爆发后，日军和伪蒙政府开出优厚条件，拉拢劝降伊盟蒙古王公仕官，不仅在沙王方面未发生作用，即在全盟，亦鲜有投敌的记录。以事变初期蒙胞在国民党武力镇压下的凄惨境地和仇恨心态相比照，伊克昭盟蒙古民族在伊盟事件中对抗日立场的坚持，远较一般意义上的抗战宣示与战争支援更富有民族大义的意涵。

共产党的顾全大局。在伊盟事变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同情蒙民，也有其政治利益与策略考量，总体上还是本其一贯的方针政策，以国共和平为底线，有理、有利、有节地策动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内反共顽固派，支援蒙古官民。在涉及国家最高利益的问题上，中共方面往往心照不宣地与

① 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蒙民部：《目前绥蒙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37年6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70页。

② 沙克都尔札布：《蒙旗宣慰使公署等工作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第32页。

③ 沙克都尔札布：《蒙旗宣慰使公署等工作报告书》，第32页。

④ 《阿委员谈伊盟事件的记录》，《伊盟事变》，第237页。

国民党政府达成某种默契。事变初起时，出于对日伪阴谋的忧虑，中共方面派人劝阻鄂旗武装的起事，对国民党稳定伊盟局势发挥了助力。发生蒙汉民族仇杀后，中共坚决加以制止，与国民党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同一立场上。伊盟事变毕竟是中国内政发生的问题，何况在御侮图存的国难时期，更需要维护民族团结的中国形象，以免被敌伪和国际势力利用。基于这一需要，国民党对伊盟事变实行了新闻封锁。有趣的是，仿佛有某种默契，共产党的媒体，包括在国民党政府管理范围之外的陕甘宁边区主要媒体，也在回避伊盟事变。1943年4月下旬，延安举办蒙古同胞公祭成吉思汗仪式，来自伊盟的边区政府委员那顺德力格尔发表演说，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那顺委员的演说，都对伊盟事变绝口不提^①。直至7月底8月初，中共媒体铺天盖地地指责国民党政府，反击“第三次反共高潮”，此时的中共主要报纸才在那顺委员遗言和蒙民代表发言的报道中点到为止地批评国民党对伊盟事变的镇压^②。中共在伊盟事变中的应对策略及其实践，反映出共产党人对国家的责任感和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操。

国民党的反省与革新。在伊盟事变的全过程中，国民党体制内始终涌动着批评与反省的声浪。事变之初，绥蒙会委员、伊盟中学校长经天禄，伊盟协赞专员邹焕宇，平绥路党部特派员刘桂等国民党人以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伊克昭盟的有关情况。事变发生后不久，针对陈长捷处置失当的批评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渠道涌向国民党决策层，对国民党的策略调整发生了影响。同时，国民党有关方面就伊盟事变及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加以痛切反省，并做出政策与策略调整，改进其对蒙工作。1943年7月20日，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向蒙藏委员会批转了一份有关伊盟事变的检讨和建议文件，文中对国民党治蒙工作予以痛切的指责，指出：“这一次事件，把蒙旗社会，和中央治蒙政策的变革过程划分为两个时代，中央历年对治边的苦心，及经费的消耗，均付诸大江东流而去，不但没有增加蒙汉间的感情，反而增长仇恨的生长，这是从事边疆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要彻头彻尾的忏悔。”^③6月22日，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向蒙藏委员会批转《伊盟事变之由来及今后蒙政改进的途径》一文，更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治蒙政策：“中枢与地方治蒙之步调不一，蒙旗王公与青年对中

① 1943年4月26日《解放日报》，第2版。

② 分见1943年8月14日《抗战日报》，第4版；1943年7月24日《解放日报》，第2版。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第131页。

枢与地方之认识亦不同。时而宣抚，时而制裁，前边修路，后边拆桥。”该文对国民党在伊盟事变中表现出的应急能力大加否定：“政治工作未能防患于前，军事力量不能呼应于后，竟听其数百叛徒窜扰各旗，生者无辜，死者诚冤。”^①在检讨与反省的基础上，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人事更替与工作的改进。在事变过程中，国民党出于危机处理的需要，陆续做出了军垦缓办、撤销屯垦局、停止征购军粮、解决蒙旗保安团经费军服、救济蒙民、安抚王公、约束军纪、查办军事干部等政策和方法的调整。事变后，国民党就对蒙工作的政策、方法、原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明确了较为全面的改进办法。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对察哈尔蒙旗特派员马鹤天的建议表示认可，马认为今后对蒙工作，应“由注意安定转而注意进步，于建设中求安定；由注重王公转而注重青年，尤注重蒙民；由蒙民自治转而蒙汉共同自治，不分畛域。”^②11月，绥蒙指署根据伊盟事变的教训，拟具对蒙工作方针9项，包括以经济连锁方式转换蒙地资源，发展蒙旗经济，增进蒙胞福利；绝对保障蒙旗利益，不沾蒙人便宜；调整蒙旗私垦地佃户与旗府关系，化解民族矛盾；整顿驻军纪律，防止军队扰民；优给保安队饷服，以弭乱源；整合驻蒙各机关和人员，观点一致、步调协同，以求中央政策的准确落实；扶持各旗中努力抗战之蒙旗人士，形成各蒙旗的领导中心，以“寄托一切责任”，等等^③。

战争的烟云已然散去，内争的仇恨也在淡化，中华民族大和解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在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的兄弟姐妹，用他们的勇气、智慧甚至生命，书写了五千年来最为悲壮、最为辉煌的历史，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资产。每一个民族解放事业的参与者都有资格接受后人的理解与尊重，无论他们有过什么样的失误。伊盟事变只是八年抗战这一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伊克昭盟一隅之地的人物和故事，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痛苦，一个时代的矛盾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折射出植根于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心灵深处的拳拳爱国之心。

① 《资料汇编》第4辑，第59~61页。

② 《资料汇编》第4辑，第78页。

③ 《资料汇编》第3辑，第13~14页。